



论清代的尊孔和 崇奉喇嘛教

商鸿逵

有清一代对孔子和达赖班禅两大喇嘛，给予了极为崇高的地位。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他亲莅曲阜，拜祭孔庙；以达赖、班禅及哲卜尊丹巴为藏蒙人民无上的宗教主。总玄烨和其前后凡五帝，均一贯奉行不怠，从而收到广大汉族和藏、蒙族，当然主要是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和藏、蒙族上层分子，使他们倾向清朝，无生贰心。若说这是带有政策性的措施，也无不可。而清统治者于此却能运用自如，取信于众，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成功。本文试就其活动经过和内容，略举所见，并加赘论于下。

一、尊孔

当明万历朝努尔哈赤以女真族建州卫中一个衰落家族子弟，凭其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经过三十多年的斗争，统一女真，脱明建国。应当承认，他是中国女真族中的一个伟大人物。但是，他只具有弓马本领及粗略的战略战术。传说他好看小说《三国演义》，汉文水平也不过如此而已。努尔哈赤并不明了如何为治国平天下之道。观其以八和硕贝勒共持国政的训言，说明他的政治知识只是中国历史上边区部落约束子弟的方法。至于其创制满文，冶炼铁器，也只是为了需要，实不足

以言文治。有一段颇富意趣的有关当时状况的记录，抄举于此：

辽阳生员杨某，顺治十七年总督松江，与无锡进士刘果远会饮，演梨园。酒酣，杨拍案呼曰：“止，板误矣！”刘问曰：“老总台精审音律乎？”杨曰：“余命亦借是获存。初辽东之破也，恐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又二年，恐富民聚众致乱，复尽杀之。惟四等人不杀：一等，皮工能为快鞋，不杀；二等，木工能做器用，不杀；三等，针工能缝裘帽，不杀；四等，优人能歌汉曲，不杀。惟欲杀秀士。时余为诸生，……面颇肥白。被获，问曰：“汝得非秀士乎？”对曰：“非也，优人耳。”曰：“优人必善歌，汝试歌之。”余遂唱四平腔一曲，始得释。”①

所谓辽东之破在天命六年（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沈阳、辽阳相继为后金攻占，明经略袁应泰焚死于辽阳城楼，明军大溃。听言后金兵在努尔哈赤率领下的这种肆行杀戮，应是可信据的资料。至于清实录记述种种恩德，当为后代饰美之词。

披览清初记载，提出尊孔及必须有知识分子参加，方能具备国家规模，讲求治平之道，乃是由皇太极开始的。我们看，尚在天聪初年即命达海翻译汉文书籍。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为了加强文字使用效率，将满文增添圈点，这正说明其文化

的发展和进步。但这时皇太极还未能深知诵习儒家经典的必要，“上（皇太极）幸文馆，观巴克什达海所译武经”^②，很显然，他所注重的是军事知识。后来天聪、崇德数年间，多次举行考试，从满、蒙、汉人中具有文化的录取生员举人。^③当时为了从习武经到读儒经史籍曾是经过一番争辩的。天聪六年汉官王文奎上《条陈时宜》云：

昔鲁哀公问政，而孔子对曰：“文武具在方册。”孟子又云：“圣如尧舜，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且汗（谓皇太极）喜阅《三国志传》（按应是《三国演义》）。臣谓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明察者，讲解翻译，日进《四书》两段，《通鉴》一章。……汗无曰：“此难能也”。更勿曰：“乃公从马上得之，乌用迂儒之常谈也”。^④

从这段话颇可反映出皇太极在当时的政治思想认识水平。翌年又以甯完我奏说：“如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则有孝经、学庸、论孟等书。……督令东拜、常耐等译写，不时呈进。”^⑤皇太极和努尔哈赤的政治理想和作风迥不相同。努尔哈赤定都沈阳，他道：“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⑥努尔哈赤就是要征服邻近，扩展势力，也即“马上得之”。皇太极即位后则是一面继续用武，一面营建都城，举凡太庙、宫阙、衙署、学宫，无不俱备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建立了孔子庙。崇德元年八月丁丑（上丁）祭孔。他曾慨叹地说道：“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

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⑦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清统治者，继续皇太极的志愿，意图统治全中国，这从多尔衮所给史可法书中不许“天有二日”之言，即清楚地表明了态度。他命多铎率军追击李自成，但却暗令到河南后即转师攻取扬州，进而捣垮南京明朝所树立的政权。所以四月三十日李自成退出北京，五月初二日多尔衮进入北京，即宣布“本朝定鼎燕京”。随着便以君临华夏的姿态，命明朝官员，“令兵部传檄直省郡县，归顺者官吏进秩，军民免迁徙。文武大吏籍户口钱粮兵马，亲赍（jì）至京。观望者讨之。”^⑧由于清入关对待内地广大各族人民作出圈地、屠城、强逼薙发、俘买人口等一系列虐政暴行，激起来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普遍南北的武装反抗斗争。必须说明，并非是南明小朝廷有什么号召力量，而是因为广大各族人民，包括大顺、大西两支农民军抱有坚决抗清的斗志。它的性质乃是由民族压迫而使明末阶级矛盾转升为民族矛盾的一场斗争。

可是，新兴的清朝却俨然以代明而治的资格自居了，当年（1644年）八月丁巳在北京派官祭孔。十月顺治帝福临由沈阳入关至京，又正式举行“亲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的大典礼，封孔子六十五代孙胤植，按照明代待遇，袭封衍圣公。恢复孔子“至圣先师”位号，修饰京师文庙。并沿明制，举经筵时必在弘德殿祭告孔子。总之，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封建传统皇帝，如何对待孔子都一一敬谨遵行。

等到康熙帝玄烨平定三藩，收服台湾，中国内部完成统一，便开始第一次南巡。其任务虽然是要去视察和治理黄河工程，但还有两项任务，应当说，也都是具

有重要性质的政治任务，一是到南京祭明太祖陵，一是到曲阜祭孔子庙。祭明陵是为表示尊重并接受前朝正统，于此且不详谈。玄烨在回銮中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子。并将这次亲到孔子家乡祭奠情况编成《幸鲁盛典》，这是清代尊孔崇儒的第一部皇家专书。玄烨在序文中说：“朕惟自古帝王，声教翔洽，风俗茂美，莫不由于崇儒重道。”其礼节之隆重，超越历代。玄烨在孔庙奎文阁前下辇车，步入大成门。在大成殿中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并宣谕曰：“至圣之德，与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广大！……特书‘万世师表’四字悬额殿中。”还把“所有曲柄黄盖留供庙庭、四时飨祀陈之。”他道：“朕今亲诣行礼，务尊崇至圣，异于前代。”^⑥诚然如此。他曾往观孔子“燕居之所”；玄烨“于堂（诗礼堂）后观孔宅遗井，命汲水尝之。”^⑦如此作法，可谓极尽亲挚倾慕之能事了！以后，其子孙皆能效法遵行，并加提高尊崇，终一代而不衰。雍正帝胤禛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乾隆帝弘历将大成殿改铺黄色琉璃瓦，意使与帝王同尊。玄烨可算得上是历代皇帝尊孔的典型。他于大力提倡诵读儒家经典之外，还以自己的理解和名义命臣属编纂易、书、诗及春秋等儒家经典。胤禛和弘历也相继有作。更要提到的是，玄烨于康熙三十六年平定朔漠和弘历于乾隆二十年平定准部，都祭告孔子，这简直和郊庙、社稷、陵寝同等看待了。

二、崇奉喇嘛教

我国西藏的喇嘛教，当明代中期经宗喀巴由红教改立黄教，衣冠皆着黄色。其教旨传演大乘，屏弃幻术。所传两大弟子为达赖和班禅。世世转生，称曰“呼毕勒罕”。此法也行之于其它“胡图克图”

（大喇嘛）。达赖三世时明武宗朱厚照曾派人往迎请他来京，中途被阻，未能实现。后俺答汗往迎，表示虔诚，并献上许多珍宝，黄教乃盛行于蒙古诸部。东北女真勃兴，黄教欲推广传播，此时值皇太极在位，其族本有萨满教及供祭堂子的信仰，并且开始接受中原儒家思想文化，对喇嘛存有排斥之见。崇德元年的谕旨说：

喇嘛等以供奉持戒为名，潜肆奸贪，直妄人耳。蒙古诸人深信其忏悔超生等语，致有悬转轮，结布幡之事。嗣后俱行禁止。^⑧

后以蒙古人来附者日众，皇太极必须考虑笼络蒙古的方针政策，其对蒙古喇嘛送来的元朝时期铸造的“玛哈噶拉佛”金像，即供奉于盛京（沈阳）实胜寺。从此和喇嘛教的关系便加亲近。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皇太极想要遣使去敦请达赖，因喀尔喀（外蒙古）“有违言，不果。”嗣后“达赖、班禅及藏巴汗、顾实汗遣伊喇固散胡图克图等贡古物，献丹书，先称太宗为‘曼殊师利大皇帝’。曼殊者，华言‘妙吉祥’也。使至盛京，太宗躬率王大臣迓于怀远门。……留八阅月乃还。”^⑨这是西藏和清朝直接通好的开端。至顺治九年达赖到北京，福临接见于南苑行宫，大宴于太和殿，并特修建黄寺以居之。这座寺庙对喇嘛教起了很大作用，正如弘历所言：“嗣是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间岁奉贡遣使，咸馆寺中。而蒙古喀尔喀各部之以番觐至者，靡不识所向方，和南皈依。”^⑩

顺治十年达赖归回西藏，清朝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达赖得到这个尊号，回藏之后，大兴黄教，重建塔饰布达拉宫及各处许多寺院。^⑪应当说，这是喇嘛教在西藏和蒙古以及京师等地扩大传播的大好时机。乃竟不幸，在此以后的不长时期内

发生了一个极其不顺的变化。即顾实汗逝世，维护西藏局势的有力人物没有了；兼之达赖年纪渐老，凡事听信第巴（政务官）桑结，任其擅权行动。桑结是不愿帮助清朝统一中国的，当三藩叛乱时，他帮助吴三桂，以达赖名义出面调解，奏言：

“三桂若穷蹙乞降，可宥其一死；倘竟鸱张，不若裂土罢兵”。受到玄烨的严斥。^⑤窥其意图是在“裂土”，即使中国分裂，形成割据，西藏也要这样。后来三桂之孙吴世璠以割给西藏以中甸、维西二地乞求援助，足证他们之间的互相往来和依靠关系了。康熙二十一年三藩事件结束，达赖也死去了。于是藏中发生混乱。

先是桑结玩弄了一个把戏，假称达赖五世未死，因为“入定”，居于高阁之上，不接见人。经过玄烨的多方探查，获悉内幕真情，责问桑结。桑结不敢再行隐瞒，乃请求为他保密，玄烨答应了。但是总需要解决继承达赖的第六世的“呼毕勒罕”问题。桑结曾以己意立了一个六世，名叫“罗布藏仁青策养嘉穆错”，驻镇西藏的拉藏汗（顾实汗之孙，等于藏王）不同意，因此两人成为仇对。桑结阴谋毒死拉藏汗，结果反遭其杀害。于是拉藏汗奏请玄烨将桑结所立达赖废去。玄烨为了安定西藏，加给拉藏汗以封号，并命将桑结所立达赖送来北京。这个达赖在半道上病死。由拉藏汗另立的六世，名叫“阿旺伊什嘉穆错”。而青海等台吉认为这个达赖是假的，不予承认。他们又立了一个达赖，名叫“罗布藏噶尔桑嘉穆错”。玄烨感到一时难于处理，便将这个达赖安置在青海塔尔寺。这当然是个暂时的权宜办法。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噶尔丹之侄）突然率兵入犯西藏，包围布达拉宫，执杀拉藏

汗，将其所立达赖拘禁起来。于是玄烨发兵入藏平乱。清军分两路进兵，一由青海，一由四川。青海的兵兼任护送青海所立达赖，并联合蒙古诸部出兵帮助；四川的兵得到亲清的喇嘛和藏族人民帮助，乘皮船渡河，顺利抵达拉萨。两路均无大战。准噶尔兵知不能敌，退回伊犁。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这个最后的达赖六世（也即七世）在拉萨安床，那个被拘禁的达赖六世送来北京。在这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中，玄烨的对策是哪个达赖能够得到藏蒙上层分子和人民的拥戴，那个就是真的，总期依靠喇嘛教的力量安定广大西北边区。

今须加述者，为玄烨对喇嘛教的另一安排，即他对蒙古的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的地位的提高尊崇。这个大喇嘛名叫格根，是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弟，出身贵族，自幼赴藏接受达赖班禅的法戒，以他为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宗喀巴的第三弟子）的呼毕勒罕。他回到蒙古大施法教，蒙古人民奉之为活佛，实际上就是蒙古喇嘛教的教主。当康熙中期，喀尔喀内部发生矛盾争执，玄烨于康熙二十五年邀请达赖派代表和他所派大臣等共同进行调解。可是，玄烨却要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参与会议，借此提高其地位。格根在回奏中说：“今蒙圣慈念喀尔喀七旗不睦，遣使于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亦遣噶尔璽西勒图为使赴盟。谕臣亦至盟坛共议其事。臣当遵旨同赴盟所。”^⑥这次会议本已取得解决，喀尔喀汗及济农、台吉等“俱至噶尔璽西勒图、泽（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前设立重誓，自今以后当永远和协。”^⑦而厄鲁特蒙古（西蒙古）最强首领噶尔丹抱有统一蒙古的野心，更加桑结与之勾结帮助，互通消息，因而他也派人到会观察动静。噶尔丹派的人便指责喀尔喀对待达

赖代表不够礼敬，即谓不应使哲卜尊丹巴与之同等坐席。以此激怒了土谢图汗，将其执杀。于是双方战争爆发，喀尔喀战败，全部尽遭噶尔丹兵践踏。喀尔喀之众商议何去何从之计，格根是一个最有权威者，他主张奔往内地。于是率领人民抵达内蒙古，玄烨急命安置在科尔沁水草地带，并发给粮食、衣服、牲畜、银两，直到战争告一结束，方重返故乡。

玄烨对格根的亲昵优待实超过达赖、班禅。喀尔喀诸王归回外蒙古后，格根即跟随玄烨往来于北京、热河间，不离左右。在北京旃檀寺中玄烨和他对席参禅。其后他虽偶归蒙古，而大多时间则留北京。他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逝世于北京。清朝政府给他的评语是：

“泽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原系法教内之第一人，数世行善，垂九十年。当噶尔丹叛乱时，身率七旗之喀尔喀等来归，最为有功！……圣祖仁皇帝（玄烨）面谕之曰：‘癸卯年，朕寿七十，尔寿九十，大庆之年，尔必前来，断勿食言。’胡图克图领旨而回。今虽年迈衰病，遵谕来京谒见梓宫，志愿已遂，泊然示寂。”^①

胤禛对之备极哀荣，除“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例，给赐名号印册”，胤禛还巧合地讲出：“皇考圣祖升遐系甲午日；今胡图克图圆寂亦系甲午日，佛果圣因，证明不昧。”^②他亲至灵前“悬帕供茶”。格根对祖国的巩固统一作出重大贡献，清朝政府称之为功臣，是当之无愧的！

三、赘论

玄烨自幼是一个肯于勤学的人，在中国帝王当中很是突出的。他于所写《乾清宫读书记》中自道：“朕自冲龄，性耽学问，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视事，讲

臣执经，群工入奏。……有闲则书册翰墨之外，无他嗜好。”^③又道：“宫中图籍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经寸……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④

综观玄烨一生称得上是个“敏而好学”的人。然而他却不是一个“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儒生，正是如他所常讲的要学“帝王之学”。他的“崇儒重道”虽然遵顺父祖所行，而更是和他接近一些好讲道学之人有关，举例说，如熊赐履，就是他早期受到影响的一个。赐履每言“自开辟以来未有及孔子；自秦汉以来未有及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后绝无仅有之人。”^⑤这话玄烨很能听得进去，认为把孔丘、朱熹抬高，是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妙着。但是他并不是想作“登堂入室”的颜、曾、思、孟那般人物；作为皇帝来说，他决不是梁武帝肖衍，而是要用儒术道学收拢汉族知识分子，并以此统治广阔的中原地区的雄才大略的君主。玄烨六次南巡，口称是省方问俗，实际上乃是，一治理黄河，解决漕运；二联络知识分子，使之倾向清朝（治理黄河我另有专文，不再于此多述）。玄烨于康熙十八年举开“博学鸿词科”，延来大批学者文士到北京参加考试，接受官职，命他们纂修明史，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笼络手段和安置方法。此外，对不甘心入彀的高蹈之士，也给予宽容优礼，如傅山、李圜笃等即是。其后对具有影响的著名大儒孙奇逢、顾炎武、李颀、黄宗羲以及梅文鼎等，即赞扬其本人，且任用其门生子弟，凡此种种，皆为清史上盛传之美谈，毋庸赘述。再观玄烨在南巡中屡屡接见当地在家的官员及知识分子，并且多具趣闻。兹略举数事于下：

玄烨第一次南巡（康熙二十三年），至苏州，曾参加过博学鸿词科，授给翰林院编修的汪琬，闲居在家，亲来迎驾。玄烨“赐汪琬书字，凡行楷三十有五行，一百三十有一字，乃临故尚书董其昌所录诗余三阙也。……未又有‘癸亥（康熙二十二年）春临董其昌书’九楷字。”^{②③}可证玄烨的“临池洒翰”不是自夸的。

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至苏州。这天正好是玄烨的诞辰，本地知识分子举人吴廷桢、顾嗣立等迎驾，嗣立进“万寿圣德诗一千字”。廷桢的“举人”资格是冒籍在北京顺天府考中的，被黜了，玄烨特给予恢复。在第五次南巡中（康熙四十四年），玄烨又至苏州，“集举、贡、监、诸生与山林川泽之士于学宫，亲定诗题而试之”。来了个扩大规模的考试。这回仍有顾嗣立等人，“每人给路费银六十两，俱集阙下内廷供职。”^{②④}这批人都参加了《佩文韵府》、《广群芳谱》、《历代诗余》、《钦定方輿路程考》等书的编纂工作。更有趣的是，玄烨要考冒籍被黜的吴廷桢，命其登上御舟，作一首七言绝句，限用“江”韵。他写的是：“绿波潋滟照船窗，天子归来自越邦。忽听钟声传刻漏，计程今已到吴江。”当他写出前二句时，接不下去了，正在焦急间，忽听御舟上的钟声作响，即景生情，而诗遂成。一时笑称此钟为救命钟。

弘历事事效法祖父玄烨，也举开“博学鸿词科”，也作过六次南巡。他照样来收拢知识分子，并且更加扩大优待。乾隆二十二年，对“浙省进献诗赋考取一等之童凤三、陈文组、顾秀、钱受谷，著照乾隆十六年之例俱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②⑤}按乾隆十六年为弘历第一次南巡，曾召浙江诸生谢墉等三人为举人，授给内阁中书官职。同时对“江苏、安徽二

省进献诗赋考取一等之进士王昶，著授内阁中书，遇缺即补。曹仁虎等六人，俱著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②⑥}弘历的这种作法即玄烨对汉族知识分子政策的继续。治清史者谈起康熙、乾隆两次博学鸿词，每以为康熙朝名儒高士多有拒辞；乾隆朝则惟恐不前，殊不知这正说明五十年后这一着的成功。

然而必须指出，对尊孔作得最诚挚敬慎样子的玄烨，他自己既不要当忠笃的儒家信徒，而且更不愿意满族人当信徒。尽管他勤习诗书，熟弄翰墨，而于满汉界限却是严加区分的。创制发展满文的达海，通晓汉籍，“满洲群推为圣人”^{②⑦}，祭酒阿里瑚请求从祀孔庙，竟以汉官陈夔一言而止。^{②⑧}若玄烨有所主见，陈夔何敢发此议论。又阿什坦翻译《大学》、《中庸》、《孝经》等儒书多种，以教满族人，他是满洲科举廷试第三名。曾上奏：“学者立志宜以圣贤为期，读书务以经史为重。”又奏云：“治国莫重于教化，教化莫重于风俗。……于是满洲人知崇正学，尚经术，而邪说不得行。”^{②⑨}阿什坦的操守极高，权臣鳌拜胞弟穆礼玛之妻为阿什坦之妹。鳌拜希望见他，坚拒不往。像这样的人诚可称为粹然儒者。玄烨也曾赞美说：“阿什坦，我朝之大儒也。”^{③⑩}按道理说，阿什坦是可以进孔庙而无问题的，然而未能。由此使我想起严复评议玄烨之言：“即如从祀文庙一端，汉人所视为绝大政本者，圣祖（玄烨）且以为无关政体，故不许满人从祀孔子庙庭，其用意可谓远矣。”^{③⑪}我却说，其心思可谓妙矣！嗣后乃孙弘历比祖父更加用意，用汉文写了数百卷集子，到处吟诗刻石。而对满人名字译汉不许与汉义相通。偶闻侍从讲汉语，便大加申戒。及至中期以后，满族文士皆仿汉人有雅字别号，所谓“国书”已成具

文，可以说，这祖孙二人对此实在是枉费心机！

至于对喇嘛教，清统治者曾是给予崇奉尊敬的，除达赖和班禅两大师而外，其于哲卜尊丹巴和章嘉两胡图克图，也并加尊崇，一如对孔子和程朱。然而，玄烨对假道学也经常冷嘲热讥；对反复无常的喇嘛也必予查究严惩。他和他祖父皇太极所见相同，并不迷信，他说：“若蒙古等惑于喇嘛，室中所有，为之罄尽。此皆愚人，但崇信祸福之说，而不知其终无益也。”^⑥

可是，玄烨和弘历却大费国帑，修盖喇嘛庙，在西藏自毋庸论，热河的外八庙，原来并不止八个，主要为喇嘛庙，即弘历所言“因其教不易其俗”。^⑦北京的雍和宫，乃是弘历以其父胤禛为皇子时的府第，扩展兴建，成为北京最大规模的一座喇嘛庙。

玄烨为要迎取拉藏汗所立达赖六世来京，有一段讲话，说：

兹遣护军统领席柱等往取假达赖喇嘛及第巴妻子时，诸皇子及诸大臣言，一假达赖喇嘛，取之何为？朕意以众蒙古俱倾心皈向达赖喇嘛。此虽系假达赖喇嘛，而有达赖喇嘛之名，众蒙古皆服之。倘不以朝命遣人往取，若为策安阿喇布坦迎去，则西藏、蒙古皆向之矣。^⑧

其用意的所在完全道破。因此，我们读弘历《喇嘛说》一文，就益发明晓清统治者的意图究竟了。弘历特制了两个金奔巴瓶，一放置西藏，由达赖或班禅将各个呼毕勒罕的名字，书签放入瓶内，会同驻藏大臣共同掣签，抽出谁来就是谁。一放置北京的雍和宫内，照样由“理藩院堂官会同掌印之札萨克达喇嘛共同掣签”，从而产生蒙古胡图克图的新呼毕勒罕。此法既不违背黄教所信仰，更可取信于众，不能说不是一种高超微妙的措施方法。

总之，清朝统治者，特别是玄烨和弘历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是成功的，其成功的惟一原因，是善于“因势利导”。恩格斯讲过一段话：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⑨

这话恰好可以揭示其成功的原因和道理。

-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辽阳陷》。
- ② 蒋良骥《东华录》卷二，天聪五年正月。
- ③ 同上书卷三，天聪八年四月，崇德三年八月。
- ④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 ⑤ 同上书，天聪七年七月初一日。
- ⑥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天命九年三月己酉。
- ⑦ 《清史稿·太宗本纪一》。
- ⑧ 《清史稿·世祖本纪一》。
- ⑨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七，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⑩同上。^⑪蒋良骥《东华录》卷三，崇德元年三月。
- ⑫ 《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西藏》。
- ⑬ 《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七《御制重修黄寺碑文》。
- ⑭ 《清史稿》卷五百二十五，《西藏》。
- ⑮ 魏源《圣武记》卷二。
- ⑯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二十六，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乙卯。^⑰同上书卷一百二十九，康熙二十五年十月戊午。
- ⑱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元年三月丙申。^⑲同上。
- ⑳ 清圣祖《御制文集一集》卷二十。
- ㉑ 同上书卷八《官中自课记》。
- ㉒ 唐鉴《清朝学案小识·守道学案》。
- ㉓ 汪琬《尧峰文钞·御书阁记》。
- ㉔ 顾嗣立自订《闾邱年谱》。
- ㉕ 《清高宗实录》卷五百三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庚子。^㉖同上书，卷五百三十四，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壬子。
- ㉗ 《清史稿·达海传》。^㉘朱彝尊《韩菼墓碑》。
- ㉙ 《八旗通志·阿什坦传》。^㉚同上。
- ㉛ 严复《救亡决论》。
- ㉜ 《圣祖仁皇帝起居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
- ㉝ 弘历《永乐寺碑记》。
- ㉞ 《清圣祖圣训》卷十九，康熙四十五年十月乙巳。
- 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三四三至三四四页。

〔本文作者商鸿逵，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论康熙》等。〕

〔本文责任编辑：谢肇华〕